

“如果我待在一个地方,可能一辈子就这样度过。走出去看看,人生也许不一样。”

申彪:旅行,带着心上路

■本报记者 温才妃

成都,下午4点,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大四学生申彪依然站在高速收费站路口,整整半小时过去,他与无数辆车擦身而过。

他想竖起大拇指拦车,但是心中有无数个忐忑在阻碍着这么做。“不管了,鄙视就鄙视吧!”申彪伸手拦车,半个小时后,他成功地被一对成都小夫妻的私家车“捡”走。

就这样,申彪开始了他的徒步搭车旅行。去年暑假他从重庆出发,途经四川、西藏、青海、甘肃、陕西、湖南,历时25天,花费1700余元,搭车穷游川藏线;今年寒假他又与友人相约,徒步行走海南。

拦车旅行的特殊经历

有了第一次搭车的经验,申彪的胆子壮了起来。去往川藏线的路上,他拦过拖拉机、皮卡、轿车等各类车。

从西藏芒康县如美镇到八宿县,他拦下了一辆6座的别克商务车,车上坐着2名警官、2名法官、1名检察官。

在西藏波密县郊,他搭上了当地县委书记和旅游局局长的车,听说了他的经历,旅游局局长破例让他免费参观了王古朝遗址。

行走在青藏线上,一位回族大哥的重型卡车车队接纳了他,车队中途没有休息,申彪平生第一次体验了搭夜车。

也有让申彪捏一把汗的时候。车过芒康,川藏公路狭窄如带,公路的一边是峭壁峭壁,一边是咆哮的澜沧江。藏族大哥艺高人胆大,不但把摩托车开到70迈,还在“十八弯”的山路上玩漂移,边骑还边问申彪“快不快”、“怕不怕”。

在金沙江边,申彪和短暂同行的朋友下车边检时,载他们的拖拉机突突地开走了。他们所有的行李还在车上,无奈之下他俩求助警察,坐上警车飞速地追出了几百米,却发现拖拉机停在不远的路旁。原来,拖拉机司机打算开远几百米,等待客人上车。

去往敦煌的路上,申彪沿着公路在戈壁上行走了8个小时,满眼只有沙子、山、天空,路边偶尔有车辆经过,却因高速行驶未留意到他。“当时,我已经作好了找个山洞住下的准备。”申彪说。所幸的是,在傍晚六七点,一位四川大叔将他



申彪在甘肃宕昌县拦车去敦煌。

“捡”上车。

“旅行并没有想象中的艰难。越是偏远的地方,情感越容易表达出来。”申彪说,在繁华的东部,搭车旅行未必现实;恰是在荒凉的西部,搭车成为可行的方式。

旅行不能只带眼、嘴、腿

申彪不喜欢去人多热闹的景区,在他的旅游观里,“旅行不能只带着眼、嘴、腿去,更重要的是带着心上路”。

“旅行是一件身体力行的事儿,很多大学生只有心灵的悸动,却不见真正的行动。”申彪不无遗憾地说。在海拔4000多米的“世界高城”理塘,申彪搭乘的车上坐着两位60多岁的老人,“比起动辄以高原反应为借口的空想者们,敢于实践的老年人着实让人尊敬”。

去海南之时,恰逢新闻中报道“三亚天价宰客”,同行的朋友有一丝疑虑。一路上,他们考察过当地的物价,并未像新闻中说得那么玄虚。“新闻中炒作的是阴暗面,不能因为一个地方,给整个地区扣上帽子。”对于学新闻的申彪来说,这无

形中给他上了一课。

在他看来,有一些民风民俗,不亲身体验难以感悟。元宵夜傍晚,申彪与同伴搭车前往海南东郊椰林,司机大叔中途把他们载到自家吃晚饭。车行许久仍在密林中穿行,好不容易来到大叔家里,又遇见他的拜把兄弟,一位光头的彪形大汉推门而入。一晚上,大叔竭力让二人留宿,两位大学生吓得近乎腿软。

大叔实际上是个“热心肠”。不仅如约把他们送至目的地,还交代人好生照顾他俩露宿。申彪琢磨,这种彪悍的民风与海南古时是偏远蛮荒之地有关。也恰是因为与内陆隔离,他在海南看见了大量宗祠,“宗祠中摆放有学生的课桌、士大夫纪念馆中设有幼儿园,这种敦厚的长者之风,对教育下一代很有帮助”。

旅途中的景色很美,申彪被可可西里的满天繁星所震撼,也一度回想起夜里扑通扑通坠落的海南椰子。然而,欣赏美景的兴致也有被突然打断的时候。

在川藏公路上,由于藏传佛教布施教义的存在,乞讨的人随处可见。在拉萨,申彪将午饭吃剩的糌粑打包,穿过小巷时,一个藏族小男孩嚷着

“追梦人”的拉萨骑行之旅

■本报记者 廖洋 通讯员 王鑫 赵慧玲 赵燕

都是被面包车运走的,但我没有向烂泥路妥协,硬是走过去的。”董加林说,“骑不动就推,推不动就扛,一点一点向前走,总能走到目的地。”

“风餐露宿路遇贵人”

在成都,董加林他们碰到了4名也要去西藏的“同道中人”,便相邀一起出发。这四名临时队友给“追梦人”骑行队很多帮助,让他们可以摆脱一次次困境。

路途遥远不宜携带大量食物,也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每天的伙食特别简单。早饭午饭基本都是“啃馒头,吃大饼,就咸菜”,晚上才会吃上一顿热饭。住的是路上最便宜的旅馆,白天骑车累了就“天为被,地为席”在路边睡一觉,起来以后继续赶路。

一位徒步去西藏的驴友,看到他们在路边“就着咸菜啃馒头”,便把自己带的瓜子、饼干、八宝粥、凤爪等食物分给了他们。“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旅途中的奢侈品了。”董加林说。路上车子坏了,队员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怎么能修好,最后,还是在一个当地修车铺老板的帮助下才修好了车子。

这些都是“追梦人”骑行去拉萨路上遇到的贵人,没有这些人的援手,去拉萨的骑行路将会更加艰难。

“终于有了我们的足迹”

8月25日早上,在海拔5013米的米拉山上看完日出以后,一路骑行,“追梦人”骑行队终于抵达拉萨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沿途的风景真是

“给我,给我!”上前就抢他手中的糌粑,眼见抢夺未果便一把跪倒在地,抱着申彪的大腿不肯撒手。

“孩子是一个民族的未来,骨气和尊严难道不比一包糖、一包糌粑更珍贵千百倍吗?”申彪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乖乖地交出了糌粑,却迟迟未回过神来。

像个士大夫一样去旅行

“20年后,你会庆幸自己参加了此次世界大战。到那时,当你在壁炉边,孙子坐在你的膝盖上,问你:‘爷爷,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干什么呢?’你不用尴尬地干咳一声,把孙子移到另一个膝盖上,吞吞吐吐地说:‘啊……爷爷我当时在路易斯安那铲粪。’”

这个“90后”小伙始终笃信巴顿将军的名言。“如果我待在一个地方,可能一辈子就这样度过。走出去看看,人生也许不一样。”申彪说,“旅行不仅能欣赏沿途的美景,还可以结识兴趣相投的朋友。”

在川藏线上,他遇到一名总把“死了算了”挂在嘴边的女大学生。细问之下,原来女生感情失意,听说川藏线地势险恶,抱着必死的决心踏上旅途。临行前已写好遗囑。在申彪的牵线下,女生与旅途中的一名驴友相识、相恋,就此打消了寻死的念头。

在拉萨的最后两天,他遇到独自远行的建军,“当时他已经沦落到了晚上睡自助银行的地步”。经过两日的寻找,建军最后在一个餐厅打工,打算赚足路费后再出发。回去后,申彪有感于建军的励志故事,写下了一百多字的小传。

第一次旅行,申彪独自一人走完了全程。可第二次旅行,他与同伴徒步海南,仅行至1/3路程便放弃了。原来,同伴家中突逢变故,第二天便飞回广州。申彪本可以一个人走下去,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东晋王徽之雪夜访友,到了友人门前,却又转身返回。是因为兴尽了,这次旅行是为我们两人准备的,既然有一人不能走下去,便该提前结束。”

虽然匆匆结束旅行,但有一个片段让他们难忘。行至海南省东路镇约亭景区,明代海南名臣邢宥和邱浚的送别之谊勾起了他们的思绪。“这个亭子很应景,我与同伴在川藏线上萍水相逢,当时约好一起去旅行,现在正好兑现了诺言。”

太美了,终生难忘!”董加林说,沿途很多的旅行社都是专门接待骑行者的,在一些旅行社的墙上贴了好多纸条,写着好多学校的名称,他们临走时,在墙上留下了“山东科技大学”的字条,能留下自己学校的名字他们很自豪。

在这24天中,他们每天平均骑行70~100公里,最多的一天骑行了180公里,共翻越10座4000米以上的高山及两座5000米以上的雪山,历经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以及大渡河、金沙江、怒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流域,总行程2200公里。

“每次爬到山的垭口,看到遮天蔽日的经幡时,我都会对着大山说:‘哥终于战胜你了!’”董加林告诉记者。

骑行拉萨归来,并不是“追梦人”旅行的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他们又在计划新的路线,为了去看更多的风景!

24天,2200公里行程。今年暑假,山东科技大学董加林等四名同学组成“追梦人”骑行队,翻山越岭骑车从成都到拉萨,在川藏线上留下了足迹。

“我一定要去拉萨”

西藏一直是董加林神往的天堂,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在学校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了“追梦人”骑行队。有人说川藏线是“身体的地狱,眼睛的天堂”,一路骑行困境重重,为此他们必须作好充足准备。

董加林用积攒的生活费购买了自行车、头盔、自行车配件等骑行装备。为了积累经验他们还骑车去胶南、诸城练车,为骑行川藏线作好了准备。

购置好了装备,积累了骑行经验,如何通过父母这关更是个棘手的问题。“追梦人”团队成员苦口婆心地跟家里解释了好多次才获得父母同意。

7月18日,董加林独自乘坐火车去了成都。稍作休整后,7月23日,他与学校里三名志同道合的同学会合,踏上了骑行川藏之路。

“没有翻车的骑行不算是一次完整的骑行”

川藏线的难度超出了“追梦人”的想象,一路上坡下坡,最长的坡达到四十多公里,而且全是坑坑洼洼的“搓板路”。这一路注定要克服很多风险和意外,海拔4000米以上的旅途是对身心的严峻挑战。“第一天我特别兴奋,充满了各种遐想,但身体先吃不消了,第一天就感冒了,发着烧赶路。”董加林说,为了不耽误行程,还是要坚持骑行。

翻车、摔倒是路上骑行的常事,最危险的一次三车连撞,董加林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抵达拉萨的前一天晚上,在米拉山上看完日出后,继续赶路。由于连日颠簸休息不好,几个人都又累又饿。“当时我的脑子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大脑基本不转动,只靠意志力撑着向前骑。”董加林说。他们停下喝了几包咖啡才勉强提起了精神,稍作休整后,继续前行。走到一个下坡时,车已经开始加速,由于队伍中有人刹车不及时,三辆急速行驶的车子撞到了一起。团队成员22岁的刘振从车上摔下掉到了路边的沟里。在队伍后面目睹了整个过程的董加林彻底吓呆了,立马刹车去扶队友。幸运的是,三名队友都没有受伤,而这只是险恶路途的开始。

暴雨、塌方、泥石流、落石这些川藏线上的“不速之客”随时都可能出现。雅江至理塘路段由于经常下雨全是黏性很强的稀泥,经常将整个轮胎裹得严严实实,直到轮子转不动。“很多人的车

学子情怀

行走的力量

■王珊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总会生出倦怠的情绪,伸着或蜷着,你会觉得怎么样都不舒服。这个时候,应该出去走走,蹚一段水,爬一座山,看看周边的风景,放空积累了许久的心情。

去什么地方呢,旅游城市还是文化古都,都不是。相比起闹腾腾的挤在景点中走马观花,我更喜欢去一些不知名的小地方,偏僻、寂静,但又有点小风景。这样的小风景,不需要门票,也没有拥挤的人群,当然也就没有旅游胜地的各种方便,需要自己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解决方法很简单,只有俩字,那就是“凑合”。

“凑合”并不是委屈自己的意思,出去玩,凡事随意一点,才会玩得尽兴,玩得开心。一个徒步者,需要的仅是帐篷,一件御寒衣服、两双棉袜,以能量食品为主的食物,所有的这些都装在背后的登山包里;除此之外,为了安全着想,徒步者还需要伙伴。

徒步的目的地往往比较偏远,人烟稀少,甚至有的地方连普通的小道都没有,荆棘遍布还需要砍刀开道。虽然碰到野兽大虫的可能性极小,但很多事情是需要团队的合作,比如说搭帐篷、生火做饭,在队伍里,队员们不仅需要各司其职,还有乐于奉献的自觉性,这是一项很锻炼团队协作能力的活动,很多人因此收获了一辈子的兄弟情谊。

在普通人眼里,户外徒步是一种非常自虐的行为,徒步者更是类似于某种神秘的组织。背着夸张的大包,负重至少15公斤,每天8小时以上的徒步,偶然打人群经过,一脸的沧桑,像是哪里逃荒回来的难民。徒步者是一项体力活。我记得有一次,因为低估了路线的难度,我们一行人从早上7点走到晚上8点,中间涉水爬山13小时,才找到了一块可以宿营的地方。到达目的地以后,大家都累瘫了,但还是强拖着疲惫的身体,生火取水做饭搭帐篷。

只有面条没有肉,行完全靠11路,脚踩悬崖头顶大雾,饮水靠天洗澡妄想,这样一口热饭就是世界的生活,着实堪比苦行僧,但局中人却乐此不疲。曾有一次和一个行走多年的老驴友坐在篝火前夜聊,听着他天南地北地胡侃自己的徒步经历,洋洋自得溢于言表。那时的我还是个菜鸟,我问他这么多年走得累不累,怎么坚持下来的。至今犹记得他当时轻轻地吁了口气,他说自己当初也是被人拉进圈子的,第一次徒步累得半死,赌咒发誓再也不要有第二次,但当晚躺在帐篷里看到璀璨的繁星布满黑夜的那种纯粹,他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在召唤他,不可抗拒,就这么一次又一次地走到了现在。

想想自己的第一次徒步也是一样,三月份的合肥,寝室里还供着暖气,野外更是冬寒阵阵。一天走下来,身体又乏又倦,我蜷缩在冰冷的睡袋中一动都不敢动,寒气从身下袭来,周围的空气都冻结了,寝室里热乎乎的暖气在大脑中虚化开来,当时觉得自己就是那卖火柴的小女孩,嘴里一直念叨着“再也不受这罪了”躺到天亮。然而回去还没过几天,就按捺不住再次外出的心情了。

作为一名徒步者,我享受行走的过程。行走是一种力量,走在路上,感官和身心都游荡在自然里,世界在刹那间变得异常安静,蝉鸣、蟋蟀声、蛙叫这些往日被喧嚣阻挡住的声音,此时却成为了主旋律。人的内心也变得柔软安静了许多,烦恼、忧伤在这一瞬间都消失了。放空了一肚的嘈杂,世界简单成脚下的一个脚印,轨迹是如此的清晰。

行走让这个世界又美好了起来,累并快乐着也不过如此吧,这样的生活,我愿意一直走下去。(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

一场“PARTY”式的校庆

■本报记者 温才妃

系还包括“百场社区公益讲座”、“百台计算机捐赠助学”、“绿色校园改造等,校方呼吁“每位师生、校友在校庆年至少参加一次社会义工活动”。

如果说“公益校庆”展示了人们的爱心,“学术校庆”则挖掘了学术活泼的一面。

让陈雨露印象深刻的是由教授们编剧,学生自导自演的哲学话剧《苏格拉底》,该剧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演出结束后就连艺术家观看之后也非常感慨,称赞“大学生演学术话剧更加自然”。“学生们在排演时,一方面全身心投入理解,一方面也通透理解了哲学第一课堂里所讲的西方民主的先进性和局限性。”陈雨露说,这是校庆中鼓励与支持的。

除此之外,“学术校庆”活动体系还包括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颁奖典礼、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千人百村”社会调研以及数十场名家大师公开课、吴玉章青年学术沙龙、人大校友大讲堂等。

“你我共同的校庆”

“一、二、三……”袁宝华、黄达、李文海、纪宝成、陈雨露五位新老校长共同切开了人大75岁生日蛋糕,上万块校庆小蛋糕陆续分到了师生手中。大家共同分享了“给母校过生日”的快乐。

“你我共同的校庆”

“一、二、三……”袁宝华、黄达、李文海、纪宝成、陈雨露五位新老校长共同切开了人大75岁生日蛋糕,上万块校庆小蛋糕陆续分到了师生手中。大家共同分享了“给母校过生日”的快乐。

“你我共同的校庆”活动包括分享校庆蛋糕仪式、首届中国人民大学体育文化节、校园欢乐汇、50多个国家留学生参加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节、50多个学生社团参加的校园文化主题展示等活动。

不仅人大本校热闹非凡,遍布在陕西延安、河北正定、美国华盛顿、旧金山等地的校友会也设立全球校庆分会场,依托13家海外孔子学院举办“中国人民大学日”主题活动。

五彩纷呈的校庆背后,远不止“玩玩”这么简单。

为联系校友返校,人大组建了在校生联系校友的“一对一”志愿服务体系,由2076个“一对一”学生志愿服务小组对应联系20万校友,邀请校友回家并在校庆日结对接待。

“以学生为主的校庆把我‘解放’出来。”陈雨露风趣地说道。以往的校庆模式,校长承担着一个辛苦的角色,不仅要动员全校师生参与,还要邀请各路的贵宾。这次校庆的创意、组织均以在校学生为主,“校长起到的是一个推手作用,助推新的校庆模式在学生为主体的模式中达到最佳的效果”。

灿烂的体育文化

1938年3月,根据刚制定的《陕大公学简

章》,中国人民大学就把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等工作交给学生会完成。长年以来,大学生在人大体育活动中承担的角色非同一般。

人大不但吸引了郭晶晶、吴敏霞、陈若琳、何姿这样的世界奥运冠军入读,而且由人大自由户外运动协会组织的登山队成功登上海拔6330米的唐拉昂曲峰,成为国内第一个登顶的高校登山团体。

校庆中,首届中国人民大学体育文化节也成为当日的亮点之一。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篮球联合会秘书长派特克·伯曼,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冰球联合会主席瑞尼·费索,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跆拳道联盟主席张雄应邀出席。此前,他们与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主席凯文·格斯珀受聘为人大荣誉教授。

4名刚刚在伦敦奥运会上夺金的人大学生吴敏霞、何姿、陈若琳、秦凯作为在校生代表与教师、校友代表共同护卫校旗,各学院师生、校友共同组成方阵入场,现场进行了太极拳、跆拳道、军体拳团体表演,举办了师生、校友共同参加的拔河比赛决赛。

陈雨露指出,体育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才培养体系中是重要的环节,通过丰富体育文化,不仅塑造师生的健全人格以及跨文化沟通能力,也充分体现了师生、校友们全面参与的校庆理念。